



同文馆

B94
52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Arthur Wright

中国历史中的 佛教

海外中国哲学丛书

〔美〕芮沃寿 著 常蕾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海外中国哲学丛书

中国历史中的 佛教

〔美〕芮沃寿 著 常蕾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7-357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美)芮沃寿著;常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

(海外中国哲学丛书)

ISBN 978-7-301-15244-7

I. 中… II. ①芮…②常… III. 佛教—研究—中国 IV. 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8544号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By Arthur Wright

© 1959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renewed 1987.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版权归利兰·斯坦福大学校董会所有(© 1959),于1987年修订。所有权利保留。经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合同,翻译出版本书。

书 名:中国历史中的佛教

著作责任者:[美]芮沃寿 著 常蕾 译

责任编辑:吴敏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244-7/B·080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8.25印张 98千字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丛书主编

安乐哲 温海明

丛书组织

王立刚 吴敏 田炜

总 序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套丛书精选了赫然于汉学家案头的那些奠基之作。这些著作是西方学宿公认的经典,在西方学界理解中国思想的进程中,这些经典奠定了范式和框架。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推开一扇窗户,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藉此领略海外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图景。

二十年前,在研究中国思想的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还横亘着一条鸿沟。西方学者在撰写著作之前,需要阅读中国杰出学者和西方同行的作品,然后才能自己落笔著述。但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人对中国思想的研究顶多是边角的余兴。中国是孤悬于西方学者研究边缘的对象,中国学者也并不重视西方人研习中国文化的著作,于是,两个学术群体之间几乎没有对话。

今天大量汉学家们的作品被翻译出版,充盈着中国的书店卖场;学者们则在中西学府之间往来切磋,络绎不绝。顶尖的中国学者臻缮了他们的外语技能,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西方同道们的研究兴趣也与日俱增。西方学者也终于能用中文和中国同行一起参加中国的会议和研讨。西方学者认识到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仍然鲜活,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就是最好的体现。

中西交流之间这个奇妙、重大而健康的转变,其缘由可谓多矣。

其一,二十年间中国已经握紧了国际政治和经济巨大餐布的一角。这个古老的国家需要一个自我理解的平台,这是她构筑新国际关系的基础。自我理解需要内部和外部两个视点。对此中国人早有慧见:“不识庐山真面目”所言即是。当把中国的哲学和文化置于

国际化、语境化的世界文明脉络中时，中国文化就会获得新的定位。

其二，对西方人而言，中国的持续开放使他们有机会直接就教于中国学者，并分享其研究之硕果。曾经遥远神秘的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学术群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陷入了经济和政治的泥淖，文化的处境也差相仿佛。政治和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已经穷途末路，旧的国际秩序亦岌岌可危。不过这个“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我们可以期待政治上的寡头霸权将要被万国协商式的全球社群所取代，经济上寡富众贫的不公要重新调配，以期天下同此凉热，仁爱泽及四海。

不过，如果我们不能在个体、群体、国家的层次上，涤除主导世界文化的个人主义之荒谬，不能认识到人类经验的有机性、生态性，不能领会人类大家庭里彼此在各个层面上的唇齿相依，上述政治经济的改善就不可能发生。

其三，众所周知，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孽因，两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沉暗无闻。今天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被广泛承认，而中国文化对外国人来说仍然神秘。我们也知道，在不远的将来，日益强大的中国将更有力量改变世界秩序，这将使中国文化成为那个美丽新世界（很有可能比现在的好）中举足轻重的因素。中国将成为文化交响的重要旋律，世界将再次听到中国文化的声音。

既然中国文化将为这个新秩序贡献良多，我们就需要尽可能透彻地了解她。我希望这套丛书翻译的著作能使此前已结硕果的研究增添一个层面：面对当代西方对中国传统进行的丰富阐释（有时也是误释），我们去追溯西方的中国思想研究历程中泽被最为深远的学术经典。

安乐哲

献给芮玛丽

前 言

本书的写作缘于我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由人类学系与联合神学院共同主办的六次演讲。主办者希望我的演讲能够在受过教育的公众中引起对这一主题的广泛兴趣,该主题既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历史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又与我们时代的文化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有关。本书所呈现的与实际的演讲大致相同,也怀着同样的希望和意图。注释和专业细节降至最少,但增加了进一步阅读的书目,以便那些可能愿意探讨该主题的某个方面的人使用。

vii

本书中的六篇文章尝试对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主题之一做一个反思性的阐释。没有人比本书的作者更明白未勘察的历史与资料的领域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这样一个阐释只能是试探性的、不完满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学者偶尔应该退而沉思那个赋予其专业研究以意义的时代与问题的连续整体。在我看来,他应该既向他学问领域的同事,也向受过教育的公众汇报他的反思结果。通过这种方式,他才有希望对理解的积累增长有所贡献,而这正是一切学术研究的正当理由。

壹

viii

本书旨在做这样的汇报:关于相对受忽略的研究领域内完成的工作、关于达成的结论、关于在事实或事件的不同秩序中识别出来的关系、关于遭遇到的和还未解决的问题。中国和佛教研究领域现代学术的迅速进展使得这样的一个报告成为可能。最近四十年来,过去被视为中国历史的神话化叙事得到了批评性的分析,而

少数的几个时代和问题慢慢地成为焦点。在前沿学者的手中,中国佛教的研究从虔诚的解经学的图囿中浮出,成为研究中国文明成长史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尤其感谢以下先驱: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塚本善隆(Zenryū Tsukamoto)教授,以及法国大学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教授。

一一致谢所有那些促进和激发过我在中国佛教历史领域中研究的人会使读者厌烦,因此请让我仅提及那些与本书直接相关的人:芝加哥大学联合神学院的院长杰拉尔德·布劳尔(Jerald Brauer)和已故的芝加哥罗伯特·哈钦斯卓越服务人类学教授(Robert M. Hutchins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为这些文章的首次面世提供了激励和契机。密歇根大学的马克斯·洛尔(Max Loehr)教授在插图的选择上友善地给予了建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小杰西·贝尔(Jesse G. Bell, Jr.)先生非同寻常的编辑才能使我受益。我的妻子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给予了专业但是很宽容的批评。玛丽·约翰逊(Mary H. Johnson)夫人耐心而熟练地打出了几次草稿,康拉德·希罗考尔(Conrad Schirokauer)夫妇帮助准备了索引。感谢艾伦(Allen)和安文(Unwin)先生允许我引用杰出翻译家魏礼(Arthur Waley)的著作,感谢《亚洲研究期刊》的编辑们允许我自由地使用我在1957年发表于该刊的论文《中国文化中的佛教——交互作用的诸阶段》(“Buddhism in Chinese Culture: Phases of Interaction”)。对博物馆及其馆长们友好合作的感谢我放在插图清单里了。

芮沃寿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1959年1月7日

目 录

总 序/1

前 言/壹

第一章 汉代的思想和社会/〇〇一

第二章 准备时期/〇一五

第三章 驯化时期/〇三一

第四章 独立成长时期/〇四九

第五章 挪用期/〇六五

第六章 佛教在中国的遗产/〇八一

延伸阅读选录/〇九五

索 引/一〇七

译后记/一一九



第一章

汉代的思想和 社会

汉代这个强健社会里发展出来的观念和价值的综合体，是后世中国许多朝代的思想的关键。佛教渗入中国的第一阶段所遭遇的，正是这个综合体和与之相伴的世界观。

当汉代制度秩序开始崩溃乃至垮台时，与该制度交织在一起的儒学也衰落了。一个根基已经动摇、撕裂的社会，成为异域的思想 and 制度得以植入的极有希望的温床。



- 3 佛教改变中国文化是东亚历史上重大的主题之一。这个历程可以追溯至将近两千年前。而且无论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人生活和思想的哪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通过检视这样一个历程,我们可以指望学到什么?在最一般的层次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的某些模式,这与我们20世纪世界的文化问题有特别的相关性。进一步的,我们可以对宗教作为把一个伟大文明的元素输入到另一个文明的载体的角色有所了解。这可能会引导我们批判地反思汤因比的理论,即:宗教在保存一个瓦解的文明和它的继任者之间的连续性元素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大乘佛教——作为“内在无产阶级的教会”,在汉文明中断时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接下来,我们可以对佛教作为世界宗教的特性,及其与其他伟大信仰的相似或不同之处,作出暂时的判断。
- 4 当我们考量佛教在中国历史中的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印度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还要警惕那些以“东方文化的一体性(the unity of Oriental culture)”为假设前提的种种阐释。最后,我们应当找到理解中国文明的线索:对其思想特有的和持久的模式的洞察;理解其文学与艺术传统、其制度以及个人与群体行为模式的关键。并且,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不把这些事物看成是静态的实体,而看成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动的环境带来的长期挑战,而随着时间变迁的文化的各个面向。

对这些范围广阔的问题和过程的考察,可以采用共时性的方式,即分不同章节讨论中国文化中受到佛教影响或改造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可以采用历时性的方式,即按时代来分割。我选择了历时性的方式。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习惯于思考一个文明整体在时间中的变化,以及这个文明的各个方面在某个特定时刻的交互作用。我尤其想要强调中国文明中的发展变化,来中和那种从赫

尔德、黑格尔、马克思到诺思罗普(Northrop)*、魏复古(Wittfogel)**一直持续不衰的欧洲中心论的执念,即认为中国人以及其他“东方”民族,如兰克的那句不屑一顾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是“永远静止的民族”(den Völkern des ewigen Stillstandes)。

对佛教与中国文明做一番如此的探究不是一件易事。很大一部分困难来自于中国佛教资料的性质。仅中国佛典的篇幅就大约是《圣经》的74倍,而且关于这些佛典的组织、文本分析和阐释的问题令人望而生畏。五十年来出现的相关的专题研究、索引和字典对分析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来说只能算是刚刚起步。而当我们把佛教与中国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探讨时,问题又加倍了。中国在一切民族中关于自身历史的记录最为篇幅浩繁,我们还处于对这些记录加以组织和分析的早期阶段——这个历史记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足以使历史学家陷入绝望。^①关于中国的现代历史研究在最近的四十年里有所进展,但最多也仅相当于对一片辽阔的未知土地的试探性勘察。

如何理解和解释我们已知的东西也构成问题。当我们说佛教影响了中国人生活与思想的方方面面时,我们是说:佛教对各方面都发生了同样的影响,以同样的方式影响到同等的程度吗?显然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文明,其艺术的、文学的、哲学的或者其他的传统通常会有其各自不同的模式和发展动力。可是,当我

* 诺思罗普(Filmer S. C. Northrop, 1893—1992),美国哲学家,著有《东西方的相遇》(*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1946)等书。——译者注

** 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 1896—1988),美国汉学家,著有《东方的专制》(*Oriental Despotism*, 1957)等书。——译者注

① 据估计二十五史翻译成英语需要4500万字,而这些尚且是整个文献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个估算来自于德效睿:《中国史书的可靠性》(Homer H. Dubs, “The Reliability of Chinese Histories”),载《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 VI, 1946),第23—43页。

- 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又发现自己对这些独特的模式不甚了了,更不用说它们以何种方式在历史中互相影响。还有,我们知道,在我们将考察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是由许多不同的亚文化构成的,但我们并不很清楚这些中国不同地域的典型亚文化的具体细节,也不清楚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专题研究和理论假设来帮助我们在这可畏的资料与问题的谜团中理出头绪。在这些思想中,我们发现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理论对我们当前的研究相当有用。他的理论讲的是在像中国这样以农为本的、阶层二分型的社会中,精英和农民是以何种方式相互作用的。他把这两个社会阶层的文化分别称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前者是有教养的、理性化的、自觉的,包含着对社会的——艺术、哲学以及制度方面的——外显的理想的连续而明确的表述。后者则是农村民众的不自觉的、缺乏批判性的民间传统——代代因袭的行为规范和信仰。如果我们铭记这一区分并注意观察这两个传统如何通过政府、经济政策、宗教和艺术相互影响,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佛教和中国文化在每个时期中的互动。

- 一说到时期,我们就碰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从过往的时间不再被看成是一个个分立的英雄壮举的高峰而是被看成一个过程那个时刻起,就开始困扰历史学者。这就是分期问题。我对本课程研究的这个过程所做的时期划分只能视为一个假设,是为了处理漫长时段和繁复事件而采取的方便的、然而也是尝试性的手段。
- 7 这些时期被冠以不同的名字,提示每个时期佛教与它所进入的文化相互作用的不同模式。不过这只代表对特定时期内何种互动模式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判断,而不是说一种模式的盛行就排除了别的模式的存在。毋宁说是这样的:在我们考量的这几个时期里都有许多模式并存,而且在一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互动模式既在上

一个时期有所预示,又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内产生回响。

在考量以如此多的途径改变了中国文明的漫长过程之前,我们应当先简要地考量汉代(公元前 206—前 220)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根据实情建立起一些基点,以便衡量和理解之后发生的变化。

汉帝国是强力统一中国的秦的继任者,它以中国北方的平原为中心,在其之前,这片土地上已有一个至少肇始于 1500 年前的可辨识的中国文明。南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下,是居住着土著的极不开化的蛮荒之地。在遥远的南方,汉朝的戍军控制着北印度支那,中国对于整个南方的扩张刚刚开始。汉帝国的西方和西北方铺展到草原和沙漠地带,在那里,中国人试图用战争或外交掌控帝国的通道。标志着中国农业边界的长城保护着帝国的北方。长城之外是养育了另一个与其敌对的生活方式的草原。在遥远的东北方,汉帝国在今天朝鲜平壤的附近建立了一个繁荣的殖民地,它维持着对南部的土地的控制,这片土地位于该殖民地和长城靠海的终端之间。

汉帝国的社会秩序基本上是一个有着两个阶级的系统。旧封建贵族统治的崩溃先是部分地由实现了统一的秦帝国(公元前 221—前 207)对封建制度的扫荡式清算所造成,最后完结于贵族在推翻秦政权的内战中的失败。有着平民起源的汉代政府将头衔和土地封赏给宗室大臣们,但或予或夺都取决于皇帝的兴致。那些封建政府的官员、东周时期逐步形成的氏族地主,和在新帝国中通过买卖或垦荒获得土地的人,成为汉代的精英阶层。他们有求知所需的富贵和闲暇。他们为汉朝的第一位皇帝提供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自此以后,他们作为官僚政府的设计者和职能人员、文化遗产的保存者和解释者,以及全国和地方的新社会秩序的守卫者继续工作而巩固自身的地位。他们之下是生活在乡村的农民,自主劳作或成为佃农,缴纳租金和税收,在从上方摊派下来的军事和

公共工程中服役,生存在温饱的边缘上。

9 汉代是一个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荒田不断地开垦,人口也许增长到了 5600 万^①。国际贸易繁荣,技术和艺术都有极大的提升。财富的得失在贸易与投机、采矿、炼铁、制盐中起伏。士族官员们(*gentry-functionaries*)始终努力抑制那些往往与帝国权力结盟的暴发户们。较为幸运的上层阶级的家族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奢华。他们在自己的田产上,在城镇中,或者在都城中建造精巧的宅院,装饰以取自或远或近的奢侈品;他们的女人们穿着时髦,纵情地享受最新的时尚。汉代中国是扩张的、忙碌而充满生机的、外向的。亚历山大·索伯(Alexander Soper)提出汉代生活的精神是:

汉代是一个疆域扩张的时代,拥有巨大的新财富和新权力的时代,政治和经济责任得以增长的时代。这个时代现实的气氛没有给反社会的梦想太多怂恿。那些能说会道的汉代人——朝臣、士兵、官员或城镇居民,身处繁忙而成功的帝国中,着迷于如炫目盛会般的都市生活。对他们来说,皇宫是对想象力最显著的刺激,这一表明人类伟大的最佳的象征物,如今以超乎想象的辉煌、巨大、多样的规模耸立着^②。

10 中国的新繁荣所带来的感官的满足,并不仅限于那些领略了首都壮丽的人。下面是一个公元前 56 年被解职的官员对他退隐庄园的生活的描述:

① 这是公元 156 年的数字。参见毕汉思:《中国的人口普查》(Hans Bielenstein, "The Census of China"),载《远东古代博物通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XIX, 1947),第 126 页,第 139—145 页。

② 亚历山大·索伯:《中国早期的风景画》(Alexander Soper, "Earl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载《艺术通告》(*The Art Bulletin*, XXIII, 1941),第 143—144 页。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卬，顿足起舞。^①

如果这就是汉代官员和士族们的急务和乐趣所在，那么汉代的思想有着一种罗马式的帝国实用主义的特征就毫不为奇了。^②在这个强健的社会里发展出的观念和价值的综合体是后世中国很多朝代的思想的关键。佛教渗入中国的第一阶段所遭遇到的，正是这个综合体和与之相伴的世界观。这个综合体是于特定的社会状况中得以成型，并在精英阶层的思想中取得权威性的。这提示出：尽管这一综合体令人赞叹地适应于帝国权力巩固和扩张的时期，但是它在一个崩溃与危机的时代却是不胜任的。

我们称之为汉代儒学的观念体系可以视作新的士族精英阶层对合理化新帝国秩序和他们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这一问题所作出的知性反应。新秩序中的许多因素，比如世袭的君主制，不是由新的精英所设计，而是超出他们的控制，萌发于历史的发展。现在他们不得不作出理论解释；并且面对这样发展出来的复杂的新秩序，早先宣扬的儒学的简单教诫显然不适用或者不足够。这解释了为什么汉代的儒学缔造者们(formulators)如此广阔地汲取非儒学的传

11

* 这首诗作者引文中没有。——译者注

① 《汉书》卷六十六。引自马伯乐：《土地政策史》(Henri Maspero, “Histoire des régimes fonciers”)的译文，载《历史研究》(Etudes historiques, Paris, 1950), 第158页。(此段引文选自《汉书》卷六十六的《杨惲传》。——译者注)

② 戴密微：《佛教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渗透》(Paul Demiéville, “La Pénétration du Bouddhisme dans la tradition philosophique chinoise”), 载《世界历史笔记》(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II, 1956), 第20页。